



郑治文
著

文明对话 与中国文化

——以『文明对话与儒学三期发展』为中心的考察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文明对话

郑治文 著

与中国文化

——以『文明对话与儒学三期发展』为中心的考察



孔子与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省级基地成果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明对话与中国文化：以“文明对话与儒学三期发展”为中心的考察 / 郑治文著. —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10

ISBN 978-7-209-09988-2

I. ①文… II. ①郑… III. ①儒学—研究
IV. ①B2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68446号

文明对话与中国文化：以“文明对话与儒学三期发展”为中心的考察
郑治文 著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 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914
 市场部 (0531) 82098027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印 装 山东华立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16开 (169mm × 239mm)
印 张 14.5
字 数 240千字
版 次 2016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0月第1次
印 数 1—900

ISBN 978-7-209-09988-2

定 价 34.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强调

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
推进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

序

现在敬呈在大家面前的这部稚嫩的小花朵，是一位只有20几岁的年轻史学博士对“文明对话与儒学创新”这一主题的初步研究和思考，愚以为完全符合推动儒学走向世界的当代诉求。

“扎根中国，走向世界”是当代学人对儒学未来发展的基本期许。“扎根中国”自不必待言；重要的是怎样走向世界。显然，唯有通过与世界各大文明传统进行深层次的对话，不断涵化新知，转化自我，互学互鉴，儒学才有可能成为当今世界多元文明格局中具有活力的精神极。

因此，对儒学的研究不能仅限于“我注六经”的历史视野下的阐释，更应有“六经注我”的哲学视阈下的“创造”。就完成儒学时代性的转化和创新而言，“六经注我”的哲学视野和方法似乎更为重要。只有把“我”的问题意识、时代感受和现实关怀不断创造性地融入儒学传统（“六经”）中，将之激活为可以回应时代问题、融入当代社会生活的重要精神动力，儒学才能彻底摆脱“进入博物馆”的窘境和“孤魂野鬼”的命运，真正成为具有光明前景的活着的文明传统。

当学界着力思考参与全球文明对话、推动儒学走向世界，以儒家思想助力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世界和平发展这一根本性的时代问题时，完全可以在“文明对话与儒学创新”这一前瞻性的思想视野下重新去回溯儒学传统本身，在其整个的发展流变和思想系统中找寻“对话性”的资源和智慧。

其实历史上，儒学一直是在文明对话机制中成长起来的。与不同文明对话既是儒学的宝贵品质，也是儒学得以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强大动力源泉。儒学第一、二期的发展与“文明对话”确实是密切相关的：在“子学时代”与诸子百家的争鸣对话中，儒学实现了由曲阜地域文化到中原华夏主流文化的第

一期发展；道教的形成、佛教的传入激发了儒学由中国走向东亚的第二期发展，依托于“三教时代”的文明对话，儒家恢廓整合三教的思想潜力，于是有了理学、心学的灿烂。在对文明对话与儒学前二期发展进行回顾的基础上，作者又在世界文明多元的“新轴心时代”的宏阔视野下对文明对话与儒学走向世界的第三期发展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诚然，这些思考还是尝试性的，毕竟“文明对话与儒学第三期发展”这一主题下包含着许多重大课题值得思考和探研。比如在未来的研究中，围绕“文明对话与儒学创新”这个中心，继续探讨儒学与基督教、伊斯兰教、自由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等精神传统在不同层次上的古今、中外对话的问题，仍有巨大的研究空间。

孟子说，人生有三乐，其中就有“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郑治文来自遥远的云南，是我指导的第7届博士生，而且是我带过的40多名硕士生中唯一一位得以继续攻读本方向博士学位者。这部著作就是他在硕士论文基础上的修改本。虽然“小荷才露尖尖角”，还存在一些不够成熟的地方，但其较为宽阔的视野、敏捷的才思和洗练的文笔，已经预示着未来科研之路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可喜前景。三年读博期间，治文发表过十几篇论文，大多是核心期刊，可以说奠定了独立、坚实的专业基础。现在他已经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留校，我们又成为同事。相信在今后的学术生涯中，通过相互激荡、切磋琢磨，会有更大的担当与造化。一个年轻博士能够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相对成型的体系，能够出版自己的学术处女作（其博士论文不久也将问世），作为导师，内心感到由衷的快慰，借此表示热烈的祝贺！

“嚶其鸣矣，求其友声。”在向儒学研究领域的爱好者郑重推荐该著作的同时，也衷心希望学术界各位先贤能给予一个青年学子以真诚的教诲，助其“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权为序。

傅永聚

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山东省文史研究馆员
山东省社科突出贡献专家
曲阜师范大学国学院院长 博士 教授

丙申 秋于曲阜

目 录

序	1
绪 论	1
第一章 一体化结构与子学时代的“文明对话”	12
一、文化突破，孔老奠基	12
二、一体化结构与子学时代“文明对话”的开展	16
三、子学的“总结集成”——董仲舒与儒学“独尊”	25
四、“整合儒法”——董仲舒与儒家政治理论的完整建构	30
第二章 儒、道对话与魏晋玄学	47
一、天学失效，意义危机——“以道补儒”的王弼玄学	49
二、魏晋之变，玄学转型——“以道抗儒”的阮、嵇玄学	54
三、集成创新，玄学造极——“儒、道和合”的向、郭玄学	58
四、“儒、道对话”视域下的玄学三阶段发展	63
第三章 “两行平衡”与三教时代的“文明对话”	66
一、“两行平衡”“心性契合”与三教对话的开展	67
二、佛教与儒、道的对话——佛教中国化及其“内在超越”之路	73
三、儒家与佛、道的对话——“内在超越”与儒学的第二期发展	98
第四章 子学时代、三教时代“文明对话”所留下的历史经验	152
一、“互补共荣”——文明对话之理论效果	152

二、“理一分殊”——文明对话的方法论指引	156
第五章 儒学的对话——“文明对话”与儒学的第三期发展	161
一、新轴心时代与文明对话	161
二、“理一分殊”视域下的文明对话与儒学第三期发展	165
第六章 推进儒学第三期发展，助力民族复兴中国梦	177
一、儒学走向世界，建设文化强国，助力民族复兴	178
二、习总书记文化建设系列讲话精神指导下的儒学重建和创新	193
结 语	208
参考文献	212
后 记	226

绪 论

儒学为主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就儒学的发展而言，当代中国已进入了“儒学重建”的时代。可以说，儒学的重构与新生构成了当代儒学研究领域最为宏大而切要的课题。我们认为，讨论儒学的重建与创新仍不可避免“古今中西”的文化论争，仍需从如何科学对待文化传统，如何正确参与文明交流两个方向来破题。对此，我们应该以习近平总书记近来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尤其是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精神作为理论指引，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努力转化儒学传统；坚持“维护文明多元、尊重各国文明传统”，推动儒学积极参与文明交流和对话。在总书记“延续民族文化血脉，推进各种文明交流”的重要理论精神指导下，实现儒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2014 年 9 月 2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九·二四”讲话），他坦言：“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明，不仅对中国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强调：“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推进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是让世界变得更加美丽、各国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的必由之路。”另外，就如何科学对待文化传统，如何正确进行文明学习借鉴的问题，总书记还特别提出了对待文明传统的“四个原则”的重要论断。他指出，正确对待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和现实文化，是我们必须把握好的一个重大课题。为此，我们应该注重坚持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尊重各国各民族文明、正确进行

文明学习借鉴、科学对待文化传统的四个原则。^①

在我们看来，对于如何回应“古今中西”的文化论争，将儒学重建和创新的理论工作付诸实践的问题，总书记“九·二四”讲话提出的对待文明传统的“四个原则”完全能为我们提供一种方法论上的科学指引。“四个原则”为我们清楚地指明了儒学发展创新的必由之路在于：科学对待儒学传统，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正确进行文明学习借鉴，维护世界文明多元，加强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具体来说，儒家要积极参与全球文明对话，在与各种文明的交流交融互学互鉴中实现儒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我们确信只有坚持“走出去”，注重在文明对话中深化自我认识、培育自知之明，不断涵纳新学、融化新知，儒学才能可大可久、永葆活力、日新又新、不断进取。我们从“文明对话”的视域切入来探讨中国文化（主要是儒学三期发展）的问题，也正是基于习总书记提出的“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推进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这样一种设想：即在“延续民族文化血脉”的视野下，以“文明对话”为论域，回顾儒学在“子学时代”“三教时代”的文明对话中实现第一、二期发展的历史事实，诠释出儒学的“对话性”品格，确认其作为一种“对话性传统”的特质；在“推进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的视野下，对当代儒学的发展创新提出参与全球文明对话的要求，充分发扬其“对话性”的优秀品格，积极开展同世界各大精神文明传统的对话交流。

我们知道，“求真”与“致用”是历史研究的两个向度，“致用”绝非简单地将历史重施于当下，而是透过对史的“求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并对当下发挥指导、对未来发挥启引的积极作用。这就是说，我们在追问历史真相、回溯历史事实的同时，还要有所前瞻，以古鉴今、指导现实。因此，我们探讨“文明对话与中国文化”这一主题时，其要在于以文明对话作为一后设性的诠释视域去反观中国文化发展转进之历程，在回溯的基础上作一番积极的前瞻；此即以对话性为主线，回顾中国文化的“过去”，展望其发展未来。具体说来，就是由“文明对话”的视域切入，探求中国文化“分

^①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

合转换”的规律，追问其发生发展的基本动力，揭示文明对话与儒学前两期^①发展的密切关联，以期对当今“文明对话与儒学第三期发展”的现实课题提供某些有益的借鉴和指引。^②

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合转换不仅表现在社会政治领域，中国文化发展进程中也常常呈现这样的周期性“规律”。西周文化维新，“郁郁乎文哉”，元典创制，礼乐昌明，学在官府，道术为一；春秋战国礼坏乐崩，“道术将为天下裂”，儒墨道法，诸子蜂起，百家之学，异彩纷呈；秦汉一统多元归儒，“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综罗百家，整合诸子，子学和合，化生儒术；魏晋南北朝国家纷乱，“儒者之风益衰”，纲常崩坏，儒学式微，儒玄道佛，三教纷争。中唐以降三教和合，“三教于是乎可一矣”，禅宗崛起，理学建构，全真勃兴，文化圆融……可见，文化的分合转化不是简单机械的宿命循环，乃是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因使然。诚如冯天瑜先生所言：“‘分而合，合而

^① 儒学三期发展的论说由牟宗三提出，经杜维明推拓、再诠释后而为学界熟知。牟宗三在《儒家学术之发展及其使命》和《从儒家的当前使命说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两文中明确提出了“儒学三期发展”的问题。牟氏认为，儒学的第一期发展并非先秦，而是从先秦一直到两汉；第二期则是由宋以至于明清，主要以宋明新儒学为代表；民国以后儒学应当有第三期的发展，发展民主政治和科学的“新外王”构成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核心课题。杜维明基本沿用了牟宗三的看法，他说：“在历史长河中，儒学分为三期。第一期是从曲阜的地方文化逐渐成为中原文化的主流（公元前6世纪孔子时代一直到汉代末期）……从11世纪（唐末宋初）儒家文化复兴即宋明儒学开始复兴，儒学发展进入了第二阶段。儒家文化从中国文化的一个侧面成为（像日本学者岛田虔次所说的）东亚文明的体现。儒家文化从中国传到朝鲜、越南、日本、东南亚有海外华人社会的各地……现在，‘儒学到底有没有第三期发展前景’的问题，一直是我们关注的问题。”[杜维明：《文明对话与儒学创新》，载《大连理工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2期。]当然，在新的时代语境下，杜维明对“儒学第三期发展前景”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创造性见解。正如彭国翔所说，“对于第三期发展的内容，如果说牟宗三基本上还是着眼于中国范围内儒学自我更新的问题，那么，杜维明则进一步将其置入一种全球性的视野中来加以考察。……可以说，杜维明最为晚近的儒学三期说包涵了两个基本点：首先，儒学三期发展如今面临的问题是要使儒学走向世界，不再仅仅是中国、甚至东亚文明的主要组成部分；其次，就儒学的世界化来说，儒学第三期发展所蕴含的课题必然是文明的对话”（彭国翔：《宗教对话——儒学第三期开展的核心课题》，载《孔子研究》，2006年第3期）。综上所述，“儒学三期发展”不唯有时间的意义，更有空间拓展的意涵。就时间的意义言，所谓儒学三期发展就是以先秦至汉作为第一期，以宋明新儒学为代表的第二期；现在，儒学到底有没有第三期发展前景是我们所关注的问题。从空间拓展的意义来说，所谓儒学三期发展，前两期则是“儒教中国”“儒教东亚”的形成，就当下以及将来儒学的发展而言，儒学第三期发展是指儒学从东亚到全球的地域性扩展，文明对话则是其中的应有之义。本文论“儒学的三期发展”以时间之意义为主，兼及空间拓展的意涵。对于“儒学第三期”，我们认为现代新儒学只是一个光辉起点，至于儒学到底有没有此前景仍值得当代儒者不断去参与和追寻。

^②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以文明对话为主线去回溯中国文化发展转进之历程，本意在对中国文化传统与世界各大精神传统“对话”的现实课题有所展望。然碍于所学，对中国文化传统中道家、佛家等与当今世界各大精神传统对话的问题，并非我们能力所及。这也正是我们在探讨“文明对话与中国文化”这一主题时，强调以“文明对话与儒学三期发展”为中心来考察的主要缘由。

分’的周期性转换，并非平面式的循环往复，乃是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每一次分意味着文化向丰富多元发展，每一次合意味着文化向深刻综汇迈进”^①。文化之“合”，不是简单相加，量的变化；而是有机整合，质的飞跃，是在文化争鸣与对话中调适整合各文化要素，和合化生为新的文化模态。

轴心时期，文化突破，文明奠基，孔老并立，确立中国文化儒道互补之格局，儒道互补成为两千多年中国文化发展的一条基本线索。孔老开先，诸子继起，裂道而议，遂成战国百家争鸣之风气。整合诸子，熔铸新的文化模式成为战国至秦汉中国文化发展的根本方向。诸子之学虽号称百家，数其要者，惟儒、墨、道、法四家是矣，所谓诸子整合很大程度上来说就是儒、墨、道、法四家交涉互动、凝集融合为新的文化和合体的过程。具体表现为，在哲学层面，以儒道互补融合搭构新文化模态“天人合一”的基本框架，法家、墨家思想则从功利现实层面予以丰富和完善。战国中后期出现了儒、墨、道、法初步调和的新文化形态——道家稷下黄老学和儒家荀学。黄老学以道论法，兼纳儒墨诸家，凭其综合集成之优长，战国后期逐步崛起，汉朝初年受到统治者推崇，盛极一时。战国末年儒家荀子之学以儒为主，调和道法的尝试也已经预示着汉代儒学的发展方向。汉儒董仲舒循此路径继续开拓前行，援引诸家，改造儒学，构筑了儒家本位和合诸子的新儒学体系。自董仲舒出，则标志着中国文化由丰富多元的子学文化向多元和合的经学文化转进的基本完成。汉武帝接受董子之议，遂诏“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儒学独尊地位得以确立，“儒教中国”^②得以形成，从洙泗源流到华夏主脉，这标志着儒学第一期发展的完成。这一巨大飞跃，与儒家在与墨、道、法等诸家的竞争、对话中获得丰富和提升密切关联。从春秋到秦汉，中国文化经历了由“分”而“合”的演进，中国学术主潮也实现了由子学向经学的转型，在这个过程中则伴随着儒、墨、道、法等诸家的互动与对话，此即子学时代的文明对话，它构成了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文明对话的第一大阶段。在子学时代文明对话过程中，儒、道、法三家思想资源最为重要，儒道互补、儒法整合是对话的关键环节，道家黄老学与董子新儒学则是对话的两大理论成果。汉王朝从尊崇黄老到“表彰六经”，黄老学和儒学相继占据官学位置，这种不争的历史事实充分表明了

① 冯天瑜、杨华、任放：《中国文化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10页。

② 我们这里所谓“儒教中国”取的是“儒学教化下的中国”的正面意义。

子学时代文明对话相资互济、互惠共赢的效果。子学时代的文明对话无疑构成了中国文化由子学向经学转进的一个基本动力。

汉魏以降，儒学一元独尊的文化局面被打破，中国文化再次向多元化方向开展，道家复兴，佛教初起，形成中国文化史上儒、释、道三教互拒互斥、相融相和的新格局，开启了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文明对话的第二大阶段——三教时代的文明对话。经持久的对话交涉、调适整合，以心性论为主要契合点，^①唐宋以后终于实现了三教的有机整合，佛、儒、道相继构创了“三教和合型”的文化范式，禅宗、理学与全真道。儒、释、道三教整合不仅孕育化生了禅宗、理学、全真道三大理论成果，成就了儒、释、道的文化高峰，由此也带来了中国文化的整体提升和进步。“以儒治国，以道治身，以佛治心”铸就了相对圆满圆融的中华文化体系，最终定格了以儒为主，佛道是辅的基本文化格局。同时，儒、释、道三教以心性论为契合点的和合创新，作为中国文化三大主脉的儒、释、道向内在心性化方向的共同开展，则预示着中国文化由恢宏博大的汉唐型向内敛精致的宋明型的转进。^②另外，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化佛教宗派传

① 方立天：《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上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02页。

② 笔者认为，关于中唐以降中国文化向内在心性化开展，当以“内外并进”的视域来探讨，即“内在理路”与“外缘条件”的结合。对此，我们将之概括为“心性和合”与“唐宋变革”。所谓“心性和合”就是儒、释、道三教以心性论为主要契合点的和合创新。关于“唐宋变革”早已成为中国古史研究的常见范式，兹不赘述。陈来先生曾提及宋明理学研究当在“唐宋变革”视域下加以探讨。他认为，像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那样将唐宋变革上升至“近代化”的高度，失之过急，因为，一般所理解的近代化的经济基础——工业资本主义尚未出现，但唐宋之交中国社会历史的变化确实是相当深刻的，而且从文化上来看，这个提法对于唐宋之交的历史演变的深刻性实有所见。与魏晋以来的贵族社会相比，中唐以后的总趋势是向平民社会发展。中唐以后的“文化转向”正是和这种“社会变迁”相表里。在文化上，中唐出现了三大动向，即新禅宗运动，新文学运动，新儒家运动，这三个运动的发展持续到北宋，形成了主导宋以后中国文化的主要形态。（陈来：《宋明理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除了上述社会学的视角外，刘子健先生则从政治史的角度探讨了两宋之际中国文化转向内在的问题。他认为，现代历史学家常常忽略两宋的差异而更重视唐宋之际的巨大分野。他强调南宋时期发生了重要的转型，这一转型不仅使南宋呈现出与北宋迥然不同的面貌，而且塑造了此后若干世纪中国的形象。有鉴于此，刘先生主张对这一转型的研究，应该把研究焦点置于12世纪中国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之间的互动模式。（[美]刘子健著，赵冬梅译：《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5页。）与此相类，余英时先生也是取政治与文化互动的视角来探讨两宋之间儒学由“外王”转向“内圣”的过程。不过，余先生着眼于宋代儒学的整体动向，强调南宋儒学虽转向了“内圣”但理学家们生前念兹在兹的仍然是追求“外王”的实现。他们转向“内圣”主要是为“外王”的实现作准备的，他们深信“外王”首先必须建立在“内圣”的基础上。（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诚然，无论“文化转向”与“社会变迁”相表里的社会学视域，还是政治发展和文化演进的互动模式，都是值得肯定的。然碍于儒、释、道对话与整合的主题所限，对此，我们则主要以儒、释、道三教“心性契合”的内在路向来加以说明。

至日本，整合三教之优长的新儒学也流向东亚各国，道学（道家与道教）也是东亚文化共同体得以确立的重要精神动力，这标志着东亚文化圈的正式形成。儒、释、道不仅是中国的，更是东亚的，儒、释、道作为东亚意义上的文明传统则是在三教时代的文明对话中实现的，合三教优长于一身的儒、释、道才能获得这样的提升和发展。其中，儒家思想无疑是型塑东亚价值和东亚意识最主要的精神资源，由“儒教中国”到“儒教东亚”，儒学第二期发展得以完成。这就充分彰显了三教时代文明对话的理论效果。当然，三教的对话与互动是一个漫长持久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还常常伴随着激烈的争鸣和交锋，甚至流血冲突。然“仇必和而解”（冯友兰语），文化的“和”与“合”则必是文明对话的基本指向：所谓文化之“和”是指各文化系统能够“美美与共”（费孝通语），秉持一种同情理解之态度，诉诸沟通理性，而非暴力冲突来解决文化之间的差异；所谓文化之“合”则是指调试整合各文化元素实现综合创新，向更高层次的文化形式迈进。此即中国文化史上两大阶段的文明对话所共同昭示的“文化定律”。

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演进经历了子学时代文明对话与三教时代文明对话两大阶段，显然，三教的对话与整合无疑构成了整个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旋律。当然，在这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伊斯兰教亦传入中土，并与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文化有所交融、对话，但就目前我们所见资料来看，似乎儒学对传入中土的伊斯兰教文化影响颇多，而伊斯兰教文化对儒学影响不甚明显。故而二千余年来，儒、释、道三教文化资源构成中国文化的潜在思想基因；从某种角度上说，一部中国文化史就是儒、释、道三教关系的发展史，三教之间的互补与张力构成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思想动因。中国文化分合转变的历史“规律”就主要表现为儒、道、释三教冲突融合、对话交涉、和合创新的有机整合过程。所以，三教时代的文明对话是我们探讨的重点所在。此一阶段，持续时间之久，过程之复杂，需要我们寻找一个突破口，确立一种诠释视域去梳理三教互动整合、争鸣对话这一纷繁过程。

东汉中后期儒学的式微，进而出现的中国文化危机，昭示出儒学一元主导型的中国文化体系中思想精神的缺失，这种“缺失”正好为佛、道两家的拓展留下了相当的思想阵地。当然，援引佛、道以补儒学缺失并不是直接拿来，简

单拼凑，而且儒、释、道作为三种异质的思想文化，当它们相遇结合时，往往还会发生对立、冲突、震荡、排斥，所以这就需要一个对话、选择、调适、整合、创新的过程。“整合”是人类文化学中的重要概念。所谓“文化整合”就是将各个文化元素和合为一个有机文化整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构成文化的各子系统、各思想元素互相调适，互相涵化，形成新的文化模态，这也正是文明对话的主要表现和基本要求所在。中国文化史上儒、释、道的对话与整合，就是指在争鸣与对话中，求得三教的平衡与互动、沟通与谅解，在此基础上调适儒、释、道三教的思想资源，涵化和合为相对圆融完满的新文化模式的过程。对这一过程的把握，我们应突破传统的儒学唯一中心本位的视角，进行全方位、多维度的探究，既要有以儒、释、道为个体中心的考察；又要把儒、释、道作为一个综合整体来探究。当然，无论是个体中心本位还是综合整体视角，以儒家为重心来考察三教关系的流变无疑是最重要的。这是由儒学占据社会意识形态主流地位的特殊优势所决定的：汉魏以降的儒学式微暴露了自身的思想缺陷，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学文化主导地位的根本动摇。并且，汉代儒学独尊以及儒学在二千余年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文化宗主地位的确立，绝不是统治者一时头脑发热做出的选择，也不是儒家学者主观愿望的自然落实。儒学文化主导地位的确立，其根本原因在于儒家学说与传统中国基本国情的高度契合。这一历史事实表明“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诚如蔡方鹿教授所说：“汉唐儒学之所以与先秦儒学不同，占据了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正统地位，是因为经过历史和时代的选择，儒学最大限度地适应了中国宗法社会这个基本的国情和最大的社会存在。”^① 所以，汉代以后儒学虽出现式微、低迷，一度受到佛、道严重冲击，然在国家治理、社会伦理以及中国人的基本生活与思维方式等方面，儒家仍具有佛、老无可比拟的优势。另外，佛、道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只是以一种补儒之缺的姿态出现，士人亦多以补儒之缺的心态来看待释、老二氏的，这就使得佛、道大多只能在儒学无法顾及的一些思想领域开拓发展，且其在发展过程中还往往要向儒学妥协调和，接受儒家学说的选择和过滤。

^① 蔡方鹿：《汉唐儒学基本思想特征探讨》，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1年第3期。

以儒学为中心考察儒、释、道的对话与整合，三教时代的文明对话主要表现为“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对非主体文化的佛、道思想进行选择、淘汰、改制，使之形成一种新的思维范式的过程。具体地说就是调整儒学内部结构，摒弃汉代以来儒学中神学目的论的内涵，把佛教与佛学义理和道家与道教学说中有关宇宙论、心性论这些具有形上本体论性质的思辨内容，经选择、改变后整合到儒学中来，使儒学变成一种以社会伦理为宇宙万物本原的本体论哲学”^①。在这个过程中，儒家返本开新，援引佛、道，向先秦儒学本源处复归，借鉴吸收佛、道思辨精神，最终实现了以儒家为本位的三教合一，完成了由汉唐宇宙论儒学向宋明心性本体论儒学的转变。三教和合化生的精致思辨的理学体系的出现，标志着儒学走向复兴，趋于圆熟，迎来发展高峰，此即儒学的第二期发展。

以佛教为中心考察儒、释、道的对话与整合，三教时代的文明对话主要表现为以佛教为代表的外来文化与儒、道为代表的本土文化对话互动、融合交流的过程。具体来说，就是佛教立足自我本位，以道家（教）为思想中介，与作为中国文化主干的儒家学说进行深入沟通、对话，实现佛教“在中国”到佛教中国化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佛教既保持了出世解脱的基本特色，又吸收了中国文化的现实主义人文精神，具有了“佛教的”和“中国的”的双重特色，而佛教本位三教合一的禅宗成为中国化最彻底的佛教宗派，标志着中国佛教发展迎来文化高峰。佛教中国化是中外文化对话交流的成功范例，佛教中国化孕育的禅宗，是印度佛教种子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生根、发展、繁衍、开出的智慧之果，是中华民族对世界佛教发展做出的最大贡献。

以道家为中心考察儒、释、道的对话与整合，三教时代的文明对话主要表现为老庄道家与儒、释互动交流、沟通对话的过程，其中更多的是儒、释、道（教）对道家老庄哲学的倚重和借鉴。东汉末年儒学衰落，道家之学得以复兴，儒、道交葛，互补合流化生魏晋之玄学。援道入儒，以道补儒是玄学的重要方面，这主要表现在：玄学家谈有说无的本体论建构以及对名教自然的争辩就是试图取代已经动摇的天人之学，为儒家纲常名教寻求新的理论支撑；玄学家倡“言不尽意”论，就是试图舍弃章句训诂之学直达圣人本意；玄学的自然与名

^① 王洪军：《中古时期儒释道整合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绪论》第1页。

教之争，则是试图从自然人性论的角度为儒家伦理寻找合理性依据。当然，以道补儒并非玄学的全部。总的说来，玄学是魏晋儒、道对话争鸣过程中兴起的思想潮流，儒、道对立互补应是玄学的基本内容，其中王弼玄学偏于儒，援道人儒的色彩较浓；嵇、阮玄学偏于道，儒、道对立的特点较重；郭象力图不偏不倚有所汇通，儒、道两极取乎其中。对此，下文有关部分我们将有详细论述。老庄道家与佛教、道教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佛、道两教对道家思想资源（哲学思辨的精神、逍遥无为的人生态度、元气自然的理论等）的吸收。首先，老庄玄学谈有说无的本体论、玄之又玄的思辨概念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文化土壤。正是借鉴道家的思维方式、理论范畴，依附玄学佛教才出现了“六家七宗”发展的小高潮。这标志着佛教作为一种学术思潮已登上历史舞台，至僧肇时试图摆脱玄学的影响，但这种尝试不可能完全成功。老庄玄学可以说一直伴随着佛教发展的始终，后来对禅宗建构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道家化应是佛教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其次，老庄玄学是道教提升自己理论水准所依赖的重要思想资源，老庄玄学的哲学思辨使道教哲学由粗糙走向精致。汉末“黄老道”粗糙的宗教神学演变为东晋南朝时期相对精致的神仙道教，老庄玄学的理论还是隋唐重玄学理论的重要思想依托。^①

以道教为中心考察儒、释、道的对话与整合，三教时代的文明对话主要表现为道教为改变自己的“劣势”地位，立足自我主体，借鉴吸收儒、释两家思想资源，完善提升自己教义理论的过程。具体说来，就是保持自身本土宗教的思想特色，借鉴佛教宗教理论、思辨哲学，吸收儒家现实伦理精神，调和三教思想资源化生道教新形态。宋元之际，道教终于把三教思想资源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出现了道教本位三教合一的全真道，凭借三教合一的思想优势。金元之际全真道趋于鼎盛，从一个地方性的小教派一跃成为全国性的道教宗派。

以三教综合整体的视角考察儒、释、道的对话与整合，三教时代的文明对话主要表现为儒、释、道在长期的竞争冲突中，实现沟通和解，综汇和合为新的文化整体的过程。对这一过程，张立文教授有较准确的概括：“三教互相批判，相互吸收，为三教互动提供了新的参照系和新的价值导向，独尊儒学、罢

^① 王晓毅：《浅论魏晋玄学对儒释道的影响》，载《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